

## 姚從吾《強學齋日記》中的 讀書生活

宋家復\*

本文將應用姚從吾(1894-1970)從未公開發表的《強學齋日記》(1950.12-?)，搭配姚氏其他相關著述，探討這位著名的史學方法暨宋元歷史學者渡海來臺初期的閱讀生活。本文試圖論證這位鞠躬盡瘁死於臺大歷史研究室中的史學教授，連同其他來臺的避共同仁，不僅表現出顛沛造次皆必於是的讀書人本色，更重要的，是在本地建立了一套現代史學專業的閱讀體制(regime of reading)，這套體制貫穿理論與實作，建構並且規範了從閱讀到寫作、從機構建制到真理展望的系統組合。是這套閱讀體制，填充了本地人文社會高等教研的戰後破墟，使得與其他形成中的更具威力的閱讀體制的對抗與附合成為可能。

關鍵詞：姚從吾、強學齋日記、閱讀體制、史學史、學術文化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本文所想講述的是一個歷史學者生命故事的片段，這個片段只有幾個月，就其個人而言，已過五十知天命之年，是一個飽經喪亂，流離失所，如何在臺灣開始追求重生的故事。當然，這樣的生命故事在 1949 年前後，數目不少，近年來研究挖掘漸多，本文個案之所以特出，還有其在現代中國歷史學術發展史上的意義，簡單講，這除了是一個中年救贖的故事之外，還是一個中國史學的現代性花果飄零、在本地落地生根的故事。後面這個故事比較宏大，影響時段比較長，結構意義相對深，本文並沒有辦法充分論述，但是希望藉由一份新史料的浮現，亦即姚從吾《強學齋日記》，加上一個新史學史研究概念的應用，所謂「閱讀體制(regime of reading)」，能夠由小見大，窺見中國史學之現代轉化的本地移植初期片段。

姚從吾(1894.10.7–1970.4.15)，於 1949 年正月來到臺灣，1950 年 12 月 31 日開始書寫日記。根據姚的門生與年譜撰述者王德毅(1934–2024)的說法，姚的日記書寫持續到過世前；<sup>1</sup>不過，臺大圖書館目前收藏的姚氏日記，原本只到 1953 年底，抄本則多三個月，至 1954 年 3 月 31 日止。所謂原本，是姚氏親筆小字書寫於現成的硬皮日記本上，一年一本，得見三本中，第一本為 24 開小本，另兩本為 16 開稍大本，前兩本橫寫，第三本直書，日記本中偶而有黏貼的剪報、信件、詩作、照片、收據等等；至於抄本，乃是姚氏於 1962 年間雇用王姓助理，在六百字稿紙上逐字謄寫而成，並不時有姚氏增刪的記號，雖增刪不多，但是由雇人謄抄與本人修訂兩點來看，姚氏可能有本人、抄手之外第

---

<sup>1</sup> 王德毅編著，〈凡例〉，《姚從吾先生年譜》(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頁 6。

三人讀者的設想在心裡，不排除有朝一日公諸於世的可能。以下直接引用姚氏日記處置入引號，不另加注。

## 二、姚「從吾」與「強學」齋

在首冊日記原本的扉頁，註有「從吾所好一九五一年民國四十年元月一日時任教台大住溫州街 52 巷一號」，以及「因閒得精思文室」等字樣。前者標明了日記主人的時空所在，名字的典故出處不難辨識，來自《論語·述而十二》「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過，姚氏行走於世並不是一開始就使用這個名號，他的《年譜》編者說他「原名士鰲，字占卿，一字存吾，曾刻印章文曰：『從吾所好』，取自論語，因號從吾，後即以號行。」<sup>2</sup>至於這個「後即以號行」的「後」，確切是什麼時候，並不清楚，只能間接推論。1934 年夏天姚氏在旅德十一年之後，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在當年秋天的開學典禮上，時任文學院長的胡適之(1891-1962)，介紹文學院教授到姚氏，特別說道：「姚從吾先生在本校讀書時，原名姚士鰲」，<sup>3</sup>姚氏在北大從大學本科讀到研究所是 1917 年至 1921 年(已先讀過一年大學預科)，所以改名或許是 1923 年出國讀書以後的事；另一方面，從他的出版譯著文章署名來看，1928 年的〈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作者欄還是姚士鰲，<sup>4</sup>但是隔年的〈蒙古史發凡〉作者欄是「從吾」，不帶姓，<sup>5</sup>再一年，1930 年發表的〈歐洲學者對

2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 1。

3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 21。

4 姚士鰲，〈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輔仁學誌》，1：1(北平，1928)，頁 8-92。文章最後題署：「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時寓柏林，史大哥立次(Steglitz)」。

5 柯勞斯(F. E. A. Krause)教授著，從吾譯並注，〈蒙古史發凡〉，《輔仁學

於匈奴的研究〉之後，<sup>6</sup>幾乎就都是自署姚從吾了！

由「士鰲」到「從吾」，1929年前後姚氏的生活思想發生了什麼，使得他的自我意識（「從吾」）突然增強呢？可能有幾點。第一、下決心研究蒙古史；第二，開始在德國大學擔任漢學講師，教中文。這兩者難道不是姚氏自我的初心始衷嗎？不完全是。姚氏出國前的學術興趣主要表現在帶有人文歷史意味的地理學上，與毛子水(1893-1988)二人脫穎而出，被北大蔡元培(1868-1940)送到德國留學，目的也是造就地理人才，但是他們到了德國，改變了初衷。這個轉變，顯然不僅僅是一個人學科興趣的自然轉移而已，在同輩人的輿論期望中，姚氏出國還背負了更廣泛的文化理想，與姚氏同出於陳援庵(1880-1971)門下的晚輩、曾在臺大文學院短暫同事的牟潤孫(1909-1988)就曾這樣回憶過：

中西史學如何結合，為當前一大課題，先師(陳垣)當年全力支持姚從吾留學德國，即希望他學會西洋史學方法與中國史學相結合，而結果並不理想。<sup>7</sup>

這種透過留學達成中西文化融合的想法，尤其是在史學領域，夾雜著對於西方擁有先進「方法」的期盼，其實是一大迷思，姚氏後來膾炙人口的學游泳就是要跳進水中的「方法寓於工作之中」主張，其實就是針對這個至今猶存的通俗念想而發，雖然姚氏自己似乎始終也講不清楚這個方法與實作(practice)之間的理論關係，但是 1929 年間他顯然已經接受德國學院裡高度分工化學術研究的現實，決定先跳進蒙古史

誌》，1：2(北平：1929)，頁 74-183。

<sup>6</sup> 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國學季刊》，2：3(北平，1930)，頁 437-540。

<sup>7</sup>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 16。原出處牟潤孫，〈從通鑑胡注表微論陳援庵先師的史學〉，收入《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頁 534。王譜誤植為《治史齋叢稿》。

的水池裡面，以「專題研究」實際操作一番，而不是繼續在「通論式的歷史方法論」、<sup>8</sup>甚至上升到所謂「歷史觀」層次的探討，雖然這段期間他不是沒有嘗試著力過。<sup>9</sup>另一方面，要記得 1929 年的姚氏已經 35 歲，早已過了而立之年，用晚近研究留學生歷史的概念來說，就是面臨到了從「留學」到「學留」的抉擇時刻，<sup>10</sup>從姚氏後來偶而的留德回憶來看，他是樂不思蜀、流連忘返的，這點當然不會符合中國學界父老對他的殷殷期盼，他自己也承認，後來是老友傅斯年(1896-1950，其實比姚小兩歲)把他罵回國的，王德毅《年譜》中引用過一封姚 1963 年寫給弟子蕭啟慶(1937-2012)珍貴的私人書信，很能夠誠實表達當時這樣的掙扎，值得徵引：

我在北大的時候，頗得名師指導，如屠敬山、柯鳳蓀、張湘文先生，……所謂乾嘉樸學，是朝夕掛在嘴邊的。到德國後，情形大變了。始而驚異，繼而佩服。三年之後，見有創獲。覺 Ranke 及 Benheim 的治史，實高出乾嘉一等。他們有比較客觀的標準，不為傳統所囿。有各種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啟示、指導，可以推陳

<sup>8</sup> 姚從吾著，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全集(一)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77)，頁 2。

<sup>9</sup> 姚從吾，〈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留德學誌》，1(上海，1930)，頁 12-23。姚氏晚年曾有意重訪這篇舊文，因為臺大哲學系許恪士教授(1895-1967)開授歷史哲學一課，引發興奮的學生王萍、徐玉虎徵詢姚氏對這方面的看法。(《強學齋日記》，1951 年 9 月 22 日)這篇論文曾經收在姚氏早年的教學講義之中，參見姚從吾著，〈歷史研究法〉，收入李孝遷編校，《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上海古籍，2015)，頁 258-259。比較這份新發現的一九三零年末期開始編寫的講義，與姚氏過世後門人編輯的全集本，可以看出，姚氏編輯教學講義與備課的方式，從早年到晚年很一貫，顯然包括了自己已經成篇甚或出版的文章在內。

<sup>10</sup> 江勇振，《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2)。

出新。他們有很系統的、切實的、客觀的治學方法，他們有意想不到的設備，意想不到的環境、合理的人生觀，與合理的社會生活。五年、六年以後，我不想回國了。想在萊茵波昂大學安家了。設非當年老友傅孟真年年寄北大聘書，罵我偷懶，罵我忘棄祖國，我真怕的不回國了！<sup>11</sup>

留學深入之後所形成的思想範型轉變，甚至生活認同替換，可能才是姚氏「從吾所好」的深層意涵，要不然不至於要用更換名號這樣一個新生命的重大象徵動作來表現。即使後來的人生際遇不盡如意，人總是不一定能夠完全決定能在哪個具體時間地點生活，但是這個「從吾所好」的覺悟一旦發生，很難倒轉回返到之前的狀態。不過，覺悟只是方向，此後能不能力行貫徹乃至有所成就，姚從吾是不是就真能夠超越他未出國前的乾嘉考據學訓練，那是另一回事了！

回到「從吾所好」的原始典故，《論語》的文脈對姚氏的一生其實還有一層深意。在〈述而十二〉章裡，從吾所好是相對於「執鞭之士」、「富[貴]如不可求」的次要選擇，這個富貴當然也可以解釋成非個人、社會國家群體性的富強，但是姚氏關心甚至參與世事的大義初心，倒是名符其實——總是要求過才知道「不可求」。從 1942 年以北大歷史系主任名義聯名簽署請中央捍衛國土主權的陳情書，到抗戰後方西南聯大三民主義青年團與大學黨部的主持工作(與陳雪屏，1901-1999)，乃至勝利後 1947 年接任河南大學校長，執故鄉祭酒之鞭，1948 年獲選教育團體國大代表，姚從吾不是不曾在學術行政崗位上做一番經世致用的追求，<sup>12</sup>只不過時不我予，大局難支，這才倉皇南渡。一逃，

11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 20-21。

12 姚氏於臺大任教期間，仍身兼黨職，檔案中有中央改造委員會油印人民日報資料，知識青年黨部會議通知或記錄，救國團參與手冊等等，不過顯然不屬權力核心。對於姚氏的實踐作為，老同學毛子水知之甚詳，甚至鼓勵，見毛

1948年6月由河南開封化裝老農突圍出城一路到南京；再徙，同年底辭河南大學校長改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長，1949年正月押運文物軍艦由上海登岸基隆，輾轉臺中，依賴夫人變賣飾物維生。隔月，姚夫人受聘為彰化中學英語教員，全家遷居彰化。這段逃難的過程，正是本文取材主要文本《強學齋日記》的書寫背景，雖然姚氏輕描淡寫，在日記本的扉頁，一書「從吾所好」，再書「因閒得精思文室」，這「因閒得」三字，下的其實輕巧，大難餘生，因而「賦閒」無處餬口的困境，一筆帶過，掩飾了已經在臺中彰化鄉間蟄居一年多，當年1950年3月方才獲得臺大教職，暑假過後才得以北遷住進溫州街臺大宿舍，緩解長期顛沛造次。「精思」固然是姚氏長久教學讀書生涯的一貫嚮往，但是「因閒得」實在只能讀成1951年前後姚從吾外在處境的美化修辭。

因此《強學齋日記》的強，比較接近勉強之意。「強學」不是一個新穎的詞彙，古老的典故出自《禮記·儒行》裡，孔子回答魯哀公何謂「儒行」的問題：

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sup>13</sup>

由此衍生，漢代揚雄在《法言·修身卷第三》接著將強學與力行並稱：「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強學而力行。」<sup>14</sup>晚近喜歡用這個詞彙的，應當首推康有為，1895年公車上書之後，接連在北京上海成立「強學會」，取的主要是學以自強的意

子水，〈憶念姚從吾先生〉，《傳記文學》，16：5（臺北，1970），頁37。

<sup>13</sup> 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1278-1279。

<sup>14</sup> 揚雄著，汪榮寶注，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89。

義。<sup>15</sup>不過，如上所述，姚從吾有他自己的脈絡，為了說明，他為自己的日記起手寫了一篇序：

余性魯拙，實不適於學；況今日學問領域日新月異，牽涉益廣，往往非兼通中外學術要義，難期真有所知；因而是學而無所成就的人，在今日的中國多極了。以余質魯手拙，年逾五十，撫躬自問，而實一無所成，自亦不足為異。惟念自民國二十六年以來，兩度逃難，幸尚苟安存，時代艱迫，責任重大，亦唯有勉強認真教學，認真讀史，認真從事寫作，無愧良知而已，實不敢言學也。今日為陽曆民國三十九年除夕，轉眼舊曆辛卯，即已五十七歲。老已至而學未成，撫今視昔，良用愧恨。因決意從今天起，逐日略記所行與所思，以其期時加省覽，有所成就，且以明我尚不是甘於渴飲饑飽食，終日全然無所用心的人罷了，不是有心要做日記罷子的！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從吾識於台北市溫州街五十二巷一號強學齋寓次。<sup>16</sup>

「勉強認真教學，認真讀史，認真從事寫作」，足證強字作勉強解，引申為認真，確得姚氏自身首肯，不過這份相對於「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的「勉強而行之」，<sup>17</sup>自謙能力不夠但仍將盡力而為，就一般常態教學研究的學術社群而言，不過就是愧於盡忠職守的專業倫理而

<sup>15</sup> 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上海強學會序〉(1895年11月)，頁92。同年9月的〈京師強學會序〉似未見「自強」字彙。

<sup>16</sup>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77-78。王譜似乎未見抄本，是依原本自行標點。今引文則依抄本姚氏本人改訂痕跡存真，黑體為姚氏本人增補，原為紅字，今為期刊體例，改以粗體表現。

<sup>17</sup> 《禮記·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頁37。

已，姚氏這裡將嚴重性上升到「無愧良知」的高度道德層次，顯然是基於序文一開始鋪陳的兩樣特殊情境：一、非兼通中外難有真知的今日學問領域特性；二、自抗戰軍興十三年來兩度逃難苟安性命的餘生責任。後者之「難」，百死千迴，實繫天命；前者之「難」，兼通中外學術要義，則取決於個人天賦與學習境遇，姚氏雖然自認「魯拙」，但是得天獨厚，曾經優游德國上庠十又一年有餘，所以敢大言論斷，「學而無所成就的人，在今日的中國多極了」，或許姚氏自己也是這「在今日的中國多極了」中的一員，但是言下之意，卻是說者至少知道今日中外學術發展之大勢判準，然後依此高標準判定自己無知無成的鶴立雞群立場。這種既謙遜又自豪的認知姿態，即使顛沛流離，始終貫穿於姚從吾稍微得閒而記下的《強學齋日記》敘事論述之中。

「因閒得」三字的另一種讀法，則是反映了 1950 年底當時國共內戰與東亞國際情勢的發展。1949 年 10 月底的古寧頭戰役，暫緩了共軍局部攻勢，12 月 8 日國民政府遷都臺北，但到了 1950 年 3 月 26 日西昌撤守，大陸地區全部淪陷，四到八月，海南島、舟山群島、東山島、萬山群島陸續失守，其間重大轉折，出現在 6 月 25 日北韓軍隊向南進軍，美國兩天後宣布臺灣海峽中立化，第七艦隊巡邏，7 月底美國遠東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比蔣介石大八歲)訪臺，決定協防臺灣，<sup>18</sup>一改 1949 年 8 月《中美關係白皮書》後的袖手旁觀立場。10 月 19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陸續進入韓國，支援 9 月 15 日美軍仁川登陸後告急的北韓，麥克阿瑟「在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中，面對中國全國」，<sup>19</sup>以及雙方陣營都擔心第三次世界大

18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 488。

19 麥帥語，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著，林添貴譯，《朝鮮戰爭：你以為已經遺忘，其實從不曾了解的一段歷史》(臺北：左岸文化，2013)，頁 57。

戰的危險之下，1951年春天末期戰場大致就在北緯38度線上下膠著，同年4月麥帥被解除職務，6月在蘇聯提議下開始在板門店談判。回到姚從吾開始寫日記的1950年新曆除夕，當然無法預知膠著的東亞戰事(其實越南也有，此不贅述)，<sup>20</sup>韓戰要一直到近三年之後1953年7月27日才簽訂停火協定，但是國府及流亡來臺的知識分子度過1950整年的心情是彷彿驚弓之鳥，心境跌宕，最可以代表當時這種心情變化的，可能是曾虛白(1895-1994)在12月30日《中央日報》上面一篇〈論今年·看明年〉的專欄文字：

三十九年度的確是我們最艱苦的一年。大家回頭想想看，今年元旦我們是在怎樣的氛圍中間。西北大陸是在前年十一月裡丟光了，接著在十二月裡，又淪陷盡了西南僅存的一只角。大家到台灣來過年，驚魂初定，喘息未安，有幾個人會想得到還會有今天這樣的局面呢？一般心理都以為大勢已去，祇求在這寶島上得片刻的偷安，誰也不敢存國土重光的希望。

一年後的今日，我們又怎麼樣了呢？大家興奮得覺得覺也睡不著了。這個說：「端午節我要到北平去吃粽子」那個說：「不！清明節我就要回上海去掃墓咧！」……世界大戰立刻要爆發哩，大戰一爆發，我們就會反攻大陸哩……。

在這艱困的一年中，台灣的確有了驚人的進步。...民主國家跟極權國家的對立形勢是在今年確立了……。<sup>21</sup>

雖然後見之明看來，這段文字過度樂觀，但是共享其時當下的姚從

<sup>20</sup> 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著，詹涓譯，《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上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sup>21</sup> 曾虛白，〈論今年·看明年〉，《中央日報》，中華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12月30日，第3版「談天下事」專欄。

吾，在寫下「因閒得」三字時，可能或多或少也有兵馬惶惶中終於稍微喘一口氣那種勉強得閒的意味。

獲得臺大歷史系的教職，顯然是姚從吾得到一點喘息的關鍵，但是這個工作機會入手，卻不是沒有經過一點「勉強」過程。與姚氏先後逃遷來臺的各個中央文教機構，包含中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圖書館、曲阜孔府等等，抵臺初期，人員文物都缺乏安身之處，政府亦無經費奧援，只能各自勉強謀生；相對而言，臺北的幾個既有文教校園隨著國府遷都而自動升格為國家級單位，早一步自光復後接收過程而留下或納入的文教人士，幾經更迭，但至少是一時有宿舍可住、有教室可教書、有研究室可進修、有學生可以授業的幸運兒！以 1949 年初臺大歷史系而言，這時候教授行列包含：夏德儀(1901-1998)、沈剛伯(1896-1977)、李宗侗(1895-1974)、徐子明(1888-1973)等人，要到傅斯年在 1949 年 1 月 20 日接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之後，因應大規模的入臺人潮，當年寒假開始，展開了臺大歷史系(甚至整個文學院)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量新聘教員運動。<sup>22</sup>這其中，姚從吾與傅斯年校長本為舊友，聘任姚氏到臺大任教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但其實不然！王德毅《年譜》坦承傅當時曾質問姚：「嘿！你現在還能好好教書？」並且解釋，傅的質疑是基於「一個人當了校長，就沒有時間讀書和研究，他自己就有這種苦惱」。<sup>23</sup>這個發語詞「嘿！」很生動地表現出傅的個性，以及他與姚的長期關係，姚雖稍微年長，但是學術生涯始終步趨傅氏展開，也許姚真心佩服學棣，但傅氏對待親信的輕蔑並不總是令人舒適也是事實；就 1949 年前晚近的經歷而言，質

22 李東華，〈臺灣專業史學的傳承與轉折——從帝大到臺大〉，收入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67-195。

23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 75-76。

疑指涉的則可能是姚氏 1946 年夏天回到北京，不旋踵即棄北大歷史系主任之職，於 1946 年 12 月升任河南大學校長，這項或許是為了服務鄉梓的生涯選擇，<sup>24</sup>卻以 1948 年 6 月化裝混跡難民之中，跋涉逃出共軍佔領陣線作暫結，接下來還有一系列的殘局需要收拾。河南大學陸續有三千多人流離聚集於江南蘇州復校，姚氏一直堅持到 11 月底第二十二周年校慶，發表〈校慶告同學書〉於《國立河南大學校刊》復刊第 22 期，終於以健康理由獲教育部允許辭職(他與傅氏都長期受高血壓之苦)。這顯然是一個與抗戰時期北大撤向西南經驗不同的選擇。同時，姚氏藉著老北大人脈找到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的職務，這時的北平故宮博物院自抗戰後與中央博物院一起遷回到南京，都還沒有打開行囊，就已經準備再一次運往臺灣，<sup>25</sup>姚氏因此得以上了崑崙艦，在 1949 年 1 月基隆登岸，隨轉臺中、彰化。遠的抗戰流徙不論，晚近三年的行政職務輾轉流離，傅斯年的質疑，「嘿！你現在還能好好教書？」對於已經 56 歲的姚從吾而言，不能說不是坦誠相對！<sup>26</sup>

### 三、傅斯年喪禮之後

傅斯年畏友校長的質疑，顯然成為此下姚從吾在臺大教研生涯的

---

<sup>24</sup> 姚氏明清以下世居河南省襄城縣。

<sup>25</sup> 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121。

<sup>26</sup> 傅氏不只對老友這麼嚴厲，他接手臺大時大刀闊斧開除不少教員。當時歷史系的夏德儀先生僅有北大歷史系學歷，在大陸並未在著名大學任教過，就曾經被考慮解聘。據說是傅氏巡堂時聽到夏氏教學井然有序，方得暫時留任。傅氏後來曾經試圖徵聘北大文科研究所出身的子弟兵陶元珍(1908-1980)在臺大教明清史，可惜陶氏精神狀況不佳，無法授課。同理，招募年輕一輩的元史學者韓儒林(1903-1983)來臺不成，這或許也為姚從吾獲聘臺大提供了側面條件。

重大動機——去證明自己仍然能從事一場中年學術復興！這點可以從《強學齋日記》開始的日期得到旁證。為什麼姚從吾要自 1950 年 12 月 31 日這天開始寫日記，除了前面鋪陳的長期時空背景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時機，因為這天是傅斯年逝世的追思會。<sup>27</sup>十天前的 12 月 20 日傅校長在省議會接受質詢後腦溢血不治過世，治喪委員會擇定 31 日(周日)，在臺大法學院(今位於徐州路二十一號)舉行公祭與追思會。《強學齋日記》的第一條，就是紀錄參加這場追思會的行程，並且抄錄了若干悼念的輓聯詩文，以及姚氏個人的評鶩。姚氏印象比較深刻的輓聯，一是北大老同學毛子水自作字書：

思往日箴言，我生懶惰愧良友；

數少年同學，天下英雄唯使君。(姚評：頗見二公交情！)

另一幅則意外出自徐復觀(1904-1982)之手：

赤手障洪流，大節摩天，為一代窮酸吐氣；

白衣聞國政，孤懷卷石，想九原耿介難瞋。

有趣的是，徐聯好到姚氏懷疑是否是署名者徐氏自己寫的，還註明「當一問李定一兄，看是出自何人手筆也？」<sup>28</sup>(抄本姚氏改批語後半為「看是否出自徐公手筆？」語氣相對緩和得多，可見徐復觀當時在姚氏心目中的形象並不以文字學問見長。)追思會當天，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編印有《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姚氏瀏覽之後，品評只有沈剛伯的〈哭孟真兄〉詩，與筆名索他的一篇散文，值得一觀。索他其實是當時中文系教授伍俶(伍叔儻，1897-1966)，出身北大，但是來臺前任教經歷，主要和沈剛伯一樣，屬於南方中央大學系統，所以姚氏的佳評是帶有些

<sup>27</sup>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編印，《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1950)。

<sup>28</sup> 引下引號引文皆出自姚氏《強學齋日記》，原稿與抄本皆無頁碼，依日期查索。

許出乎意料的感受，尤其對於沈剛伯，位居文學院院長上位，但與北大、中研院都無直接關聯，<sup>29</sup>姚氏可能不無屈居人下、但褒貶有所保留之意。姚氏的保留之意，或許可以從日記中只抄錄沈氏悼詩的前半，得到旁證，未抄錄後半悼詩中有「卅載定交溯柏林」之句，那就將傅沈關係追溯到和姚氏幾乎一樣久遠，姚氏當時也在柏林，讀到這句而無深刻印象，頗不符合常情。<sup>30</sup>至於姚氏自己，除了與毛子水共作一聯，<sup>31</sup>聯中寓意在《強學齋日記》中直白表達：「孟真先生之死，文史界失去導師，中華民族亡一國士，余素敬佩之，奉如大師。」推崇之意，溢於言表，不過，這種推崇，也可能產生而今之後世上再無可以引導我之大師的意涵，在自主與附從之間擺盪。

更重要的，參加完追悼會，下午4點之後，姚氏就到重慶南路舊書鋪選書。買得《朱子語類輯略》、《戴剡源年譜》與《史通削襍》等書，還因為帶的錢少，已經挑的幾本，如《湛然居士集》、《鄭樵年譜》、《歐陽修集》等等，只能又退回給書店，「為之不慚者久之」！買書其實是一種高度受制約的行為，有個人經濟與學問因素，更有店頭市場的先在選擇限制，但一旦人書結緣，就成為讀書生活的潛在發展可能，由《強學齋日記》接下來的紀錄顯示，姚氏買書的確有讀，接下來幾周日記中充滿相關的抄錄與擴大文本搜讀，這一方面顯示姚

29 沈剛伯與傅斯年暨史語所的關係，請參看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當代》，133(臺北，1998)，頁46-83。

30 沈氏全詩：「至大至剛至尚寬，亦儒亦墨亦申韓。謗隨聲譽滿天下，論定傷心已蓋棺。壯志思延民族脈，苦心別有天人策。一眠不建九州同，此恨綿綿空啣石。(姚日記只抄至此)誘導循循出至誠，懷安少長費經營。謀人捨己躬勤儉，自奉三餐只菜羹。卅載定交溯柏林，兩年共事海之濤。移風易俗常相勗，蕙歎芝焚淚滿襟。」《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頁3。

31 聯文：「細思中夏簡冊所書，君自應稱國士；緬懷卅年切磋之益，我今痛失導師。」應該是請董作賓(彥堂)用書法寫得。

氏手邊的書不多，另一方面也象徵一個新的讀書生活即將展開。從所選的書來看，都不是什麼善本奇籍，重慶南路到底不是北京琉璃廠；姚氏的興趣，劉知幾與鄭樵屬於史學史與史學方法範疇，其他似乎都是宋遼金元相關文人的集子，包括朱熹(1130-1200)、戴剡源指的是宋末元初的著名詩人戴表元(1244-1310)、歐陽修(1007-1072)、湛然居士是耶律楚材(1190-1234)的佛門稱號。不過，無論新購舊藏，在《強學齋日記》開始書寫的時刻，姚氏的體悟是：「近來又想到章實齋說的，『零碎思想，不作劄記，則如雨落大海，一去不返』的話，所以恢復劄記式的日記」。於是，「導師」傅斯年的離世，以一種奇異的轉折，轉化成了姚從吾的新讀書生活克己自律的開始，《強學齋日記》主要是以讀書劄記的意向為主，這不能不說是歷史弔詭與生死辯證的交互作用。

隔天(民國四十年元月元日)的《強學齋日記》，就紀錄姚氏花了幾乎一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半)的暇時，讀完剛買的孫蕪侯著《戴剡源年譜》。據考察，是書當係何炳松(1890-1946)為商務印書館所主編之中國史學叢書之一，書前有「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同學弟餘姚陳登原再拜謹序」，上海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出版，陳登原(1900-1975)為知名學者，作者孫善福(蕪侯)可能比陳略長，其他所知甚少。<sup>32</sup>這本書只有146頁，應該也不貴，姚從吾買多少錢不知道，出版時定價國幣陸角。姚氏日記中還詳細地記下四點讀後感想：一、集中可見南宋亡時江南兵荒馬亂，二、蒙古統治寬容士人生活，三、可連同王應麟、周密等其他宋元交替之際文人觀察，四、《剡源集》的版本問題需要研究。顯然可見，姚從吾對陳登原序文中所代表一般重視的戴表元文學成就興趣不大，著眼的是從文本及閱讀中引發聯想的歷史變遷集體現象，而且是面臨強大

<sup>32</sup> 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頁655。

外敵南渡終究亡國的宋朝，這點當然不免令人聯想到姚氏的當代處境。姚遵守了自己前一天以章學誠為楷模的諾言，努力作割記，把握每一片思想，不讓涓滴入海，水過無痕。

1月2日、1月3日接連兩天，除了稍微應酬之外，<sup>33</sup>姚氏閉門閱讀紀念完傅斯年過世之後入手的書，這次選的是《朱子語類輯略》。現在不確定姚氏入手的是哪個版本，不過，《強學齋日記》清楚記載姚從吾作為讀者是直接讀卷8「論本朝人物」，表示跳過了各版本共通的前面幾卷，包括理氣等觀念、小學讀書法、論孔孟周程、北宋諸子到南宋李延平張南軒、自論為學訓門人、論諸儒諸子等前七卷的主題，這個不顧朱熹本人思想、以及所讀文本編纂體例，單獨以讀者姚從吾自身歷史旨趣為指導的閱讀型態，與前一天一致。姚氏二號日記詳盡抄錄了五則《語類輯略》，「以助記憶」；三號日記又選擇抄錄同卷「論中興諸相」與歷代人物以下，八大條目，其中第八條是關於歐陽修，又細分為八點，共計抄書接近六百字稿紙四張。尤其歐陽修引起姚從吾特別的興致，或許因為之前買書錢不夠必須退回書店的不快記憶，或許則是與姚氏當時正參與的教學準備工作有關。從朱熹的評論開始，姚氏在日記中說：「余案頭有《古文觀止》，因取其所選歐文十三篇讀之，覺朱子所舉甚洽當，近余參與台大『大一史料選譯』，認為只是初步之作，私意欲選《歷代文讀本》四百篇，除納《觀止》

<sup>33</sup> 二日上午札奇思欽來訪，談的其實還是關於讀書的問題。札奇思欽(1915–2009)是姚氏在北大的老學生，蒙古裔，一生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徘徊，流亡至臺北，此時正翻譯日本學者小林高四郎的成吉思汗傳，後有口述歷史，《一個蒙古老人的回憶：札奇斯欽口述歷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中午姚氏則是與另一位大陸來臺、時任臺大歷史系助教的老學生李守孔(1923–2014)，一起參加河南大學在臺同學聚餐。李氏生平，可參考胡平生，《研教兼優的史學家：李守孔先生傳》(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2)。

二百篇左右外，當再選二百篇，足成四百篇之數」。讀書人所讀何書，有時是與手頭正在從事的即期工作有關。不過，一位大學文史教授想要多讀點歐陽修文章，竟然手頭只有《古文觀止》可用，的確讓人有落拓流亡無書可用之感慨。幸好，私藏不富，但是學校裡姚氏所屬研究室的藏書似乎並不單薄。<sup>34</sup>1月4日，姚氏就到研究室，以對比《四部叢刊》中所收《史通》版本的方式，檢查除夕所買的《史通削繁》；然後下午檢索《宋文鑑》，查到歐陽修其他的相關文章如〈歐公謝表〉與〈本論〉等等。《四部叢刊》與《宋文鑑》的卷帙都不小，不可能逃難時隨身攜帶，定是臺北帝大原有藏書斐然，為顛沛來臺學者提供了暫時繼續教研工作的可能條件。至於《四部叢刊》中也收有《歐陽文忠公集》，姚氏為何捨近求遠到呂祖謙編的《宋文鑑》裡面找歐陽修的文章，日記中未解釋，姚氏絕不可能不知道先在《四部叢刊》著手，只能合理推斷，姚氏研究室裡的《四部叢刊》只怕不全，或者一時紊亂無法清查(日記中也記載函裝二十四史不利檢索，姚氏想要編索引之事)，這可能也是當時在臺大文學院裡做研究的弔詭現實：不可謂收藏不豐富，卻又時而找不到基本典籍。接下來的《強學齋日記》讀書生活不時出現類似弔詭現象。

有趣的是，姚氏校查《宋文鑑》之後，除了編選為大學生教育的文章教材設想之外，還在當天《強學齋日記》中留下更為宏大的理想計畫——宋代史料的全面蒐輯。姚氏連進一步細項都想好了：一、校印宋人文集，二、宋詩鈔續編乃至全宋詩，三、宋人列傳大全，四、全宋文，五、宋人語錄彙編，六、宋人遊記彙編，七、全宋詞。七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姚氏幾乎預示了後來宋代文史研究學界的不少大型

<sup>34</sup> 當時繼承臺北帝大時期習慣，系下採研究室制，各研究室有自己的藏書，自己保管。《強學齋日記》中多次出現姚氏處理學生或校外人士借書的問題。

計畫成果，他本人雖然生逢亂世，無法親自完成這些計畫，但是其人史料集成的胸中丘壑，不可謂不深遠，心量規模，不可謂不遠大，<sup>35</sup>更重要的，顯示史料集成乃是他讀書生活長遠旨趣的一個重要面向。要想達成這樣的目標，平日工作的紀律自然要能配合。就以1月4日的行程而言，可以說是姚氏在溫州街臺大之間讀書生活標準的一天：清晨點起床，7時早點，7時40分赴大學工作，12時半返家，1時半左右休息半小時，2時3刻赴大學，6時過方回家，晚飯後往往還會讀書至11時許。當然不時會有需要離家離校的工作或應酬，<sup>36</sup>尤其隨著國府在臺灣逐漸穩定發展，姚氏生活基本如此，二十年如一日，直到他1970年4月15日於歷史系第三研究室猝逝，再未見其謀求系主任、校長或其他「執鞭之士」職位的紀錄，至少《強學齋日記》暨其他相關傳記資料中未見。就此而言，姚氏並未愧對重新任用他的老友傅斯年校長。<sup>37</sup>

<sup>35</sup> 類似的史料大全式的規模與設想，更見細靡遺的例子，乃是姚氏所擬〈盧溝橋事變以來中日戰事史料蒐輯計畫書〉，參見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頁30-49。

<sup>36</sup> 日記初期最常見的就是為考試院或政工幹校命題閱卷，後來國民大會與救國團亦偶有涉入。

<sup>37</sup> 4月9日日記中，姚氏曾自述傅斯年重新任用自己的過程，是由蔣慰堂(復聰，1898-1990)向李濟(1896-1979)，李再向沈剛伯提議，然後聞於傅斯年，傅之前已知道姚也到了臺灣，私下與姚氏夫婦見過面，但並未主動聘用，猜測或許是因為河南大學往事，直到沈剛伯指出韓儒林已歸，李濟再次向傅探詢，傅才說「剛伯曾提議請從吾，您們辦好了！」或許，傅的遲疑也是為了表示對文學院院長沈剛伯用人權的尊重。不過當時蔣慰堂還未被允許進入臺灣，根據姚氏日記，1951年5月5日蔣氏才搭機由港來臺。

#### 四、重新學習閱讀：一手 / 二手 & 中文 / 外文

搜羅編定「宋代史料集成」這種學術企業家的雄心，並未排擠姚從吾三十歲時期以來立志所好的蒙古史專業。接下來1月5日上午，日記記載的讀書日課就回到檢讀屠敬山的《蒙兀兒史記》，<sup>38</sup>發覺書中漢醫、儒林、文苑等卷，均甚簡略，仍有改作的必要，不妨仿照裴松之注《三國志》的例子，做一部元史補證，同時達到保存原史料、增補新研究、便於觀覽的三重目的。依日記上下文，姚氏不像是在讀自己的藏書，這比較可能是研究室裡的公物。下午，姚氏則至圖書館大閱覽室查閱史學雜誌期刊，見到1940年所出《蒙古學報》，有提到1939年出版，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 1897–1964)的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中亞以往的帝國)，<sup>39</sup>其書「述匈奴建國的歷史，明日當撮錄大意，附於匈奴史研究中，以期與時共進。」考慮到當時圖書流通的速度，十年之內的期刊已經算是最新研究了！年屆耳順，戰火餘生，姚氏仍然保持追求專攻領域內新知的閱讀習慣，所閱覽1940年所出《蒙古學報》應是第1期，若非臺大在臺北帝大時期與總督府圖書室採購而來，<sup>40</sup>這本極端小眾的日文期刊也

<sup>38</sup> 屠敬山，即屠敬(1856–1921)，清末民初重要文人史家，姚從吾早年在北平曾經有親炙的機會。請參見前註11引文。

<sup>39</sup> 麥高文是美國傳奇人物，據說電影小說人物印第安那·瓊斯就是以他為啟發來源，其書全名為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Sourc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作者頭銜為西北大學政治學教授，曾任倫敦大學東方研究學院中文與日文講師。2018年同出版社曾經再版。姚氏應該未見全書，只是期刊書訊。

<sup>40</sup> 1962年9月杜維運赴英國留學，在松山機場送行的臺大老師劉壽民(劉崇

不會與來自中國北方繼承西歐域外史地研究的姚從吾相遇，這是一份奇妙的緣分。當時國外期刊新書獲得不易，<sup>41</sup>如果不是繼承殖民時期舊藏，大概總需要一點特殊管道才行。隔天1月6日下午，《強學齋日記》記載，當時應該正在美國養病的國府要員俞大維(1897-1993)，寄來曼努埃爾·科姆羅夫(Manuel Komroff, 1890-1974)的 *Contemporaries of Marco Polo* (馬可孛羅的同時人物)一書，1937年版。俞氏與姚氏係留學德國老同學，同屬於陳寅恪親戚師友團體的一部分，從遙遠的國外寄書來，姚氏反應，「旅中得此，供翻閱，亦甚可感」！僅只「翻閱……可感」，與前一天獲知匈奴研究新書「與時共進」的興奮程度大異，倒不是不感激老友俞大維不忘之情，而是因為姚氏其實擁有科姆羅夫該作1928年的初版，但是留在北京沒帶出來。新書引發的舊愁，對於初老的讀書人姚從吾而言，心中的感概可能比逃亡的千萬里還綿長。<sup>42</sup>

馬可孛羅書既是舊識，還是「與時共進」比較重要，於是如同前一天日記中的許諾，即使次日1月7日是星期天，姚氏下午仍然讀書不輟，想撮錄另一本匈奴建國歷史大意，但「試看《蒙古學報》，甚費力」！為什麼？原來姚氏日文並不精通！或者說，他當時正在學日文，和同樣出身北大小七歲的學棣同事夏德儀一道當老學生(雖然言及時非常客氣重禮的姚氏會稱卓如兄)，禮聘的家教是小他們一個世代的歷史系女助教張美惠(1924-2008)。晚近由於張氏日文口述歷史的揭露，以及本地學者的特別報

---

鏞，1897-1990)，請他買一本前一年剛出版卡爾(E. H. Carr, 1892-1982)的 *What is History?* 幾個月後這本書寄達臺灣，劉氏隨即用在課堂上，這已經是當時最應時(up-to-date)的西方史學輸入臺灣的例子了！見杜維運，〈謙虛博學的劉壽民師〉，《傳記文學》，57：5(臺北，1990)，頁70。

41 《蒙古學報》，<https://cis2.ntl.edu.tw/detail/2834690/>，擷取日期：2025年11月4日。本書原收藏在總督府圖書室，日後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編目，後移至國立臺灣圖書館。

42 類似書在北京沒帶出來的感概，日記出現好幾次(1月18日等)。

導，張美惠作為從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過渡到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的極少數本省籍學籍連貫學生，專攻南洋史而留系任教，後來與外省「匪嫌」男性通婚長期滯留西班牙，時代矛盾對立融於一生。<sup>43</sup>《強學齋日記》第一冊中，很規律地記錄每周二、四兩次上日文課，從假名到文法，有時姚氏還會稱讚同學夏德儀學得比較好，自己跟不上，不過並沒有交代這堂日文家教課是怎麼開始的，誰主動提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讀洪炎秋(1899-1980)的《日語文法精解》，姚氏覺得甚詳明，只可惜日文字母太小，不易辨識(1月15日日記)。有幾次張美惠因病請假，姚從吾等拘於禮儀，不合適自行問候，還委託另一位年輕女性助教王萍(1929-)代為致意(見1月16日與18日日記)。最可以看出姚氏與張氏互動關係的，是民國40年4月14日《日記》的一段紀錄：

十一時半，張美惠來問「西洋朝貢錄」中各專門術語，舉所知告之，代為是正句讀，土產、商品、用器、香料等，不知其所以然

<sup>43</sup> 張美惠(1924-2008)，基隆人，1944年9月畢業東京聖心專門學校(聖心女子大學前身)，10月進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是臺灣女性成為帝國大學本科生罕有的一例。1947年7月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士(她是臺灣大學第一屆文學院唯一的畢業生)。其夫卜新賢1946年4月畢業國立暨南大學，單身來臺，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教，1947年12月被捕，至1949年2月才被釋放。1949年5月兩人結婚。張美惠1954年8月升為講師；同年12月辭去教職，夫妻相偕出國，到國立馬德里大學深造。見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賴永祥等記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2007)，頁222-223。卜新賢一案，見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台灣書房，2012)，頁158-159。亦可參見周婉窈，〈張美惠：從臺北帝大過渡到臺大的傳奇及其變調〉，《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25(臺北，2018年10月)，[https://history.ntu.edu.tw/public\\_html/newsletter/public\\_html/09newsletter/25/25-07.html](https://history.ntu.edu.tw/public_html/newsletter/public_html/09newsletter/25/25-07.html)，擷取日期：2020年1月19日。張氏晚年的日文口述記錄或許不久即將問世，當可讓人不必經二手引用更瞭解其自我看法之全貌。

者尚甚多，因告以 Laufer 的 *Yraria*，及諸蕃志與 Rockhill 與 Hirth 該志譯文或可參用。張女士攜辭源辭海去供參用。

引文中的 Laufer 應指貝特霍爾德·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移民美國的德裔東方學家，姚氏指涉其著作則不詳；另一個西方漢學著作是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與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最早於 1911 年在俄國聖彼得堡出版的《諸蕃志》譯本，後來再版過幾次。這個互動比較特別的地方，姚從吾似乎了解到張美惠的外文能力不是問題，所以直接提出歐洲東方學傳統中的著作參考，反倒是中文基本的圈點句讀本事似乎還有待加強，協助之後，最終還借出一般圖書室限制館內使用的兩本中文工具書。不論就系內同事前後輩關係，或者日文家教的師生相對身分，姚氏對張氏相當禮遇。類似的禮遇態度，在《強學齋日記》中對徐先堯(1917-2007)亦然，<sup>44</sup>7月20日條姚氏曾針對徐氏來訪提議編撰大事年表，說：「余一向認為輔助台省同仁，使能卓然自立，精進國史之外，尚能利用日人勤敏精神，惟有在實際工作之中，表示實例，此非口舌所能獨任，宜以工作態度與誠懇精神實踐之。」對姚氏來說，這個立場還有一層意義，「自傳公以來的政策，是培植本省人任要職。」(民國40年7月18日日記)這個獎掖本地人才的政策，就結果論或許並不令所有人滿意，但是不能說開始時就沒有一番好的用心，也不該將責任囫圇丟在任何一邊肩上。<sup>45</sup>

<sup>44</sup> 嘉義望族子弟，日本東北帝大出身，專攻德國史。與楊雲萍(1906-2000)、陳荊和(1917-1995)、張美惠，為 1950 年代初期臺大歷史系內四位臺灣省籍教員。

<sup>45</sup> 《強學齋日記》1月20日，載有姚氏與臺籍學生談話經驗：「一為宋文薰，漢文尚通。上次試卷中提到 Jacob Burckhardt 的文藝復興在義大利，問宋讀過此書否？答云：日文岩波文庫有此書譯本。一學生劉君，甚差。宋之父為商人，劉之父為醫生，均勸他們先讀市川瓊次郎之東洋史統，熟悉國史事蹟，再讀漢文名著。臺省學生不喜說話，不知是否語言感困難？」

《強學齋日記》中所見姚從吾的讀書生活，還有一面是定期閱讀時事類報章雜誌，並且往往加以評論。例如1月7日，《強學齋日記》就抄錄《香港時報》引用前一日倫敦路透社電文：「此間《每日前鋒報》著論，為今日中共之所為，顯已達中華帝國主義前鋒之地位。……建立一新中華大帝國之陰謀。(姚氏自注：原電如上)」接著姚氏加上案語：「此為歐洲人過慮之一例，不特神經過敏，且往往誤事誤人。」後來在助理用稿紙謄抄的抄本上，姚氏又加注：「實在可笑！可惜！」雖然姚氏所屬的國民政府正在與中共殊死鬥爭，但姚氏顯然並未沖昏了頭，一味倒向西方媒體的恐中評論！隔兩天1月9日，《民主評論》第2卷第13期寄到，姚氏在上下午專業讀書行程之餘(早上元史相關、下午日文文法)，還是讀了《民主評論》，不過全期以徐復觀為首的多篇時事評論似乎都不入姚氏法眼，他獨獨鍾情一篇翻譯自美國新聞評論周刊的簡短譯文〈杜艾會談的另一透露〉(該期最後一頁)，「甚合我心，轉錄如下，藉以自勵！」此不贅錄姚氏抄文，但是他的評論更值得記得：

今年為比較上最嚴重的一年。第三次統一世界的大戰，勢將爆發。爆發遲早，能否防止，或再拖下去，實繫於俄美兩國的努力與態度。……倘至春暖夏至，美軍再將中共自南韓逐出，而大戰不爆發，極大有希望。余深信麥克阿瑟在可能情況下，必將有以慰世人也。

寄希望於美國、尤其麥克阿瑟，姚氏與前面引用的曾虛白，可能都代表當時島上知識學人的過度樂觀。1月17日姚氏閱讀毛子水送上門來

---

抑有所顧忌？常欲提倡文史之學與溝通主客關係有所努力，不教一年級通史，機會甚微，為之著急。」1月25日，姚氏監考時，發現學生黃金龍攜有日文「諏訪德太郎所編最得要領的東洋通史」，東京大修館出版，為最銷行的學生用書，姚氏著明「當訪求之」。可見姚氏是有意願藉由日文媒介親近本地學生，即使參考書之類的通俗自修用書。

的《自由中國》第 44 卷第 1、2 合期，又在一篇華府通訊的新聞評論文章中，自我印證了「私意」對於美國人的看法：「美國人的性格，做前必說，說了必做」。通訊作者許思澄與姚從吾的一廂情願(wishful thinking)都是美國將認真動員，不再像調停國共內戰時期的打打停停。不幸的是，姚許兩位對美國的觀察都不夠精準，三個月後麥帥被總統杜魯門解除職務，美國與中共繼續打打停停至今。

就在樂觀政治情勢預期中，臺大學期也近尾聲，姚從吾在 1 月 16 日進一步規劃了自己的讀書生活。《強學齋日記》目前為止兩周有餘，姚氏一方面繼續從事大陸時期以來的元史與其他專題研究，另一方面涉獵《朱子語類》、《史通》、歐陽文忠公文等「名著」，但自覺不夠，「擬增翻譯名著工作，以期溫習德文，借觀 Ranke 的德國宗教時代的歷史，試作翻譯。」<sup>46</sup>姚氏決定，以後在專題研究 / 名著涉獵 / 名著翻譯三者之間，「每日三擇二，輪流為之」，翻譯已選定蘭

46 李孝遷、胡昌智在所著《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中說：「姚從吾……他與傅斯年一樣，似沒怎麼讀過蘭克著作。」(頁 187)不過，姚氏日記中確有閱讀蘭克的紀錄，雖然只是為了溫習德文。考慮到姚氏不大可能隨身攜帶蘭克著作來臺，推測其所讀應該是臺北帝大藏書。今日臺大圖書館特藏的確有 1873 年版的蘭克全集，其中第一冊即是姚氏日記中所讀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德國宗教時代的歷史)。臺大特藏本上有不少畫線眉批的閱讀痕跡，初步的筆跡比對，很可能就是姚氏留下的讀書生活證據。筆者本來好奇蘭克著作甚多，姚氏為何獨鍾宗教改革德國歷史這本，如果上面推測成立，那麼姚氏可能只是從全集第一冊著手而已。近年大陸有圖書學者與收藏家在舊書市場上專門蒐集民國時期學者的外文藏書，也曾經找到過傅斯年與姚從吾的外文藏書，上面往往還有兩人的眉批或點線筆畫，請參見周運，〈姚從吾西方史學藏書點滴〉，收入周運，《乘雁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頁 110-128；劉錚，〈姚從吾〉，收入劉錚，《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頁 94-104。承陳華秋學棣賜告此圖書界訊息，特此致謝！

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中文則以宋代《朱子語類》與《困學紀聞》為涉獵範圍。果然下面幾天的日記，幾次出現利用夜晚時間翻譯蘭克的紀錄。因為要溫習德文，加上不時需要閱讀經常多語文穿插的東方學著作，姚氏感受到強烈的工具書需求，1月19日日記最後不禁感慨：「覺雙解漢和大辭典，已不敷用，需要「邁耶百科全書」與Brockhaus在手頭備查。每值牽涉外族問題，即覺所知外國文字之不夠用，至感愧恨。」<sup>47</sup>可惜，姚氏溫州街家中能夠隨手查閱這兩種德文世界通用工具書的機會不大。需要溫習德文，藉著像蘭克這樣的史學名著來溫習，顯然是姚氏這樣有過長期留德經驗的學者獨有的「新知培養轉深沉」的方式，也完全符合他在日記開頭序文中提出的今日學術標準：「今日學問領域日新月異，牽涉益廣，往往非兼通中外學術要義，難期真有所知。」

## 五、結語

至此，姚從吾《強學齋日記》中的讀書生活大致景象，以及這種讀書生活所代表的「閱讀體制(regime of reading)」已經展露無遺。所謂「閱讀體制」概念，借自澳大利亞文學理論學者約翰·弗魯(John Frow)，他在1986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中指出：

簡言之，閱讀體制是允許讀者對於文本有所作為的依據，接受或轉化那些被視為規範性的解讀，將閱讀與其他社會實踐和其他

---

<sup>47</sup> 「邁耶百科全書」應指 Meyers Konversations – Lexikon，是德國學者、出版商約瑟夫·邁耶出版的一部百科全書，由他本人創立的萊比錫文獻學研究所出版。1839–52年初版第46卷，1840–55年又補編第6卷。Brockhaus應指 Brockhaus Enzyklopädie，是由布羅克豪斯出版社(英語：F. A. Brockhaus AG)所出版以標準德語來編寫的百科全書。從十八世紀末一直再版修訂到2008年最後一次紙本，篇幅達24,000頁。

符號領域相融合，並最終形構以及重新形構體制本身的範疇。從這個理論基礎出發，我們有可能進入一個後設闡釋的層次，在此層次上，我們關注的並非特定解讀的正確與否，而是闡釋的形式與社會條件及前提：也就是說，關注的是分析閱讀的政治性和閱讀的歷史性——闡釋的異質性，既是共時性的也是歷時性的。<sup>48</sup>如果這段話實在有點佶屈聱牙，不易了解，作者自己或許也感受到了，所以二十年後在另一本書中進一步做了闡釋：

閱讀體制，我指的是那些共同的諸多能力、規範和價值，它們統制著我們如何閱讀，以及我們對書籍、電影或音樂賦予何種價值……正是透過學習閱讀體制的結構，我們才能獲得背景知識以及使用規則和相關性知識，從而使我們能夠對不同的文類情境做出適當的反應。任何複雜的社會都會設定許多不同的體制，從而產生不同的閱讀模式……閱讀體制由社會機構建構和維持，其中一些機構非常非正式……正規教育是灌輸、維持閱讀體制，有時也質疑或限約閱讀體制的最重要手段之一。<sup>49</sup>

此處借用，並不強求符合弗魯原文的理論脈絡，只是借重其穿透個別與具體閱讀行為的眼光，希望深入到「統制著我們如何閱讀」背後的那些「能力、規範與價值」，具體地說，這個「閱讀體制」往往是靠著(但不限於)正規教育體制在傳遞與維護。正是藉著「閱讀體制」這個概念映照之下，幫助本文掌握姚從吾 1951 年初讀書生活的結構與模式意義，而不致流於個別人物讀書生活的瑣碎細節。可以歸納以下幾點。

首先，姚氏的讀書體制是在中年歷經喪亂、顛沛流離，幸運地回到正規教育機構之後進行的重建工作，家國不幸，卻成為史家之幸。

<sup>48</sup> John Frow,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4.

<sup>49</sup> John Frow, *Gen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47–148.

姚氏本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現代轉化之先鋒，從閱讀體制的角度來看，姚氏親身參與見證了中國近代史學教學機構所塑造的閱讀體制，從留學前後到長期擔任北大歷史系史學方法論教席，其地位與重要性不必再贅述，但是一個歷史學科閱讀體制的形構往往在歷史過程中默默變遷，並不一定會在宣言式的論述後必然風行草偃，所以談現代中國史學老是舉梁啟超新史學論述為起點並不實際，況且歷史實際發展幾乎從未依照先知宣言式的計畫展開，歷史當事者除非有高度的後設反思能力，在滾滾歷史洪流中摸索，並不容易自覺到理論與實際，在歷時性與併時性雙重變異中的現況為何。因戰亂流落到臺灣，被迫 57 歲重新開始的姚從吾，加上他留下的詳盡日記，卻提供了我們一個絕佳的機會，去觀察一位成名史家學者如何重建個人讀書生活，重建臺大文院史系，重建歷史學科在海角一隅的普世紀律。使得這個重建成為可能的，當然有 1950 年代初從臺北帝大遺留物質環境，到冷戰風起詭譎的國際情勢等等因素。但是，如果歷史沒有給出機會讓姚從吾的中年危機經歷讀書人生重建，我們今天更難理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的轉化發生了什麼。

實質上講，姚從吾中年重建的讀書體制包含幾個特點。第一、這個體制有其中國考據傳統的一面，讀書首先需要「明句讀、清段落、精校字、確考證」，所以他幫忙張美惠、鼓勵徐先堯，自己凡讀書一定問版本。第二，姚氏專攻史學方法，知道歷史專業要兼顧一手二手文本，前者越原始，後者越晚近，越好。可是他閱讀史料，已經不是為了史料原作者的意圖或體例，而是為了追求理解歷史變遷中的群體經驗，這種帶著研究者自身專題意識而可以不顧所讀文本原本企圖的方式，正是現代歷史學的閱讀特色，因此在史料文本之內可以跳讀，在所讀文本之外則追求儘可能最大程度蒐羅同時段內的史料大全，藉以完成個人的專題研究。第三，雖然閱讀生活文本中仍有經典與非經

典的分野，經典往往只限於大學教育的場域教學需求，以及個人性情語言能力陶冶，非經典則以時事報章分析為主，是個人在亂世中知所行止的依據。第四，作為「在北平國立大學習完本國歷史又到德國繼續研究歷史的第一人」，<sup>50</sup>不斷溫習舊的(德文)、並且同時追求新的外語(日文)，亦是姚氏立下的多語言閱讀範式，兼通中西學術，正是姚氏即使流亡中也引以自豪的理想。

受過現代史學訓練的讀者，上面四點幾乎都是理所當然的卑之無甚高論，這種感受正好證實了現代中國史學閱讀體制的存在；至於這個體制與非現代、非中國、非史學的閱讀體制之間的分野，往往並不是這四點構成要素或其中任一此有彼無，而是強調程度不等或涉及性質的差異。例如，姚從吾及其所代表的閱讀體制成員，與「前現代」讀書人比較，就相對比較缺乏精讀教養經典(如基督教《聖經》或儒家《四書》之類)的要求，雖然他們本人的幼時教育可能具備這方面的素養；作為中國史學過渡轉化過程中的媒介主體之一，姚氏固然重視外文閱讀，但除了青年時代曾經一度流連德國忘返，餘生從未顯示意欲自我異化離開「國史擴大綿延」，<sup>51</sup>而成為閱讀生活上的「非中國人」；至於強學齋中閱讀生活「非史學」性質書籍的缺席，最為明顯，經部、子部、集部，除非符合歷史研究的旨趣，很少提及，為愉悅而讀書(reading for pleasure)幾乎不存在，即使有，可能也隱匿於個人私生活而不屬於史學閱讀體制的顯性表述對象。

運用上述姚從吾所代表的閱讀體制及其要素所構成的理想型態(ideal type)，或許也可以幫助了解，其他或多或少也在這個體制之中，但

50 姚士鰲，〈德國佛朗克教授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新中華》，4：1(上海，1936)，頁106。

51 姚從吾，〈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大陸雜誌》，15：6(臺北，1957)，頁212-224。

是有著個人時代特色的其他現代中國史家們。例如，來到臺大的傅斯年，痛定思痛，將《孟子》與《史記》加入到大一國文的通識性共同學程之中，雖非針對史學專業的閱讀體制，但是可以說是在更大範圍的正式教育中擴大深化了既有體制。此外，姚氏 1950 年代在臺大歷史系的其他資深同事們，包含沈剛伯、劉崇鉉、徐子明等人，他們或多或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也與姚氏一同將這個現代中國史學閱讀體制融鑄於臺大歷史系的知識再生產過程之中，傳授給接下來的幾個世代。現代史學在臺灣的紮根，其實是一群中年學者在絕望中克服危機耕耘的結果。不過，那是另一個系列的故事了！

《強學齋日記》中，大量抄錄劄記所讀書文的篇幅，1951 年 4 月 10 日之後，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日記在這最初三個月之後，生活漸漸穩定，庶務、人際往來的紀錄為主，詳盡的讀書紀錄漸少，或許意味著軌道重新鋪設就緒，姚從吾所代表的中國現代史學閱讀體制，只要大環境允許，從此就穩固地繼續行駛下去了！對歷史的興趣可能是自古皆然，日本殖民下的臺灣亦然，但是姚氏所代表的揉合中西的現代史學閱讀體制要到 1945 年甚至 1950 年之後才在本地生根發芽成長；就姚氏本人而言，劫後餘生的 56 歲入臺，時勢運轉之下得到重新建立前半生閱讀體制架構的機會，亦不可謂不是有幸！姚氏的重建閱讀體制，正好提供了後死者如我等透視中國史學之現代性的一道窗戶。1949 年的變局，顛沛流離之餘，讓姚從吾有異鄉重建的機會，歷史的弔詭如此。

(本文於 2025 年 7 月 25 日收稿；2025 年 10 月 29 日通過刊登)

\* 感謝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在資料提供上的周到服務，陳華秋、陳冠傑兩位學棣的協助，以及兩位匿名評審的悉心斧正。

## 徵引書目

### 一、史料文獻

#### (一) 史料

王德毅編著，《姚從吾先生年譜》，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姚士鰲，〈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輔仁學誌》，1：1(北平，1928)，頁8-92。

姚士鰲，〈德國佛朗克教授對中國歷史研究的貢獻〉，《新中華》，4：1(上海，1936)，頁97-106。

姚從吾，〈國史擴大綿延的一個看法〉，《大陸雜誌》，15：6(臺北，1957)，頁212-224。

姚從吾，〈德國史學界所稱道的幾種歷史觀〉，《留德學誌》，1(上海，1930)，頁12-23。

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國學季刊》，2：3(北平，1930)，頁437-540。

姚從吾，《強學齋日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特藏資料。

姚從吾著，〈歷史研究法〉，收入李孝遷編校，《史學研究法未刊講義四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姚從吾著，姚從吾先生遺著整理委員會編，《姚從吾先生全集(一)歷史方法論》，臺北：正中書局，1977。

姚從吾譯注，柯勞斯(F. E. A. Krause)教授原著，〈蒙古史發凡〉，《輔仁學誌》，1：2(北平，1929)，頁74-183。

孫希旦，《禮記集解》，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編印，《傳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學生代表聯合會學術部，1950。

康有為撰，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2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揚雄著，汪榮寶注，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 (二) 報刊雜誌

《中央日報》(臺北)。

## 二、近人論著

- 毛子水，〈憶念姚從吾先生〉，《傳記文學》，16：5(臺北，1970)，頁37。
- 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林添貴譯，《朝鮮戰爭：你以為已經遺忘，其實從不曾了解的一段歷史》，臺北：左岸文化，2013。
- 弗雷德里克·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著，詹涓譯，《戰爭的餘燼：法蘭西殖民帝國的滅亡及美國對越南的干預(上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札奇斯欽，《一個蒙古老人的回憶：札奇斯欽口述歷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5。
- 江勇振，《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22。
- 牟潤孫，《注史齋叢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 李孝遷、胡昌智，《史學旅行：蘭克遺產與中國近代史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李東華，《光復初期臺大校史研究 1945-1950》，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 杜正勝，〈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當代》，133(臺北，1998)，頁46-83。
- 杜維運，〈謙虛博學的劉壽民師〉，《傳記文學》，57：5(臺北，1990)，頁69-72。
- 周運，〈姚從吾西方史學藏書點滴〉，收入周運，《乘雁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1，頁110-128。
- 胡平生，《研教兼優的史學家：李守孔先生傳》，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2。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 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 許雪姬、張隆志、陳翠蓮訪談，賴永祥等記錄，《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2007。
- 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料室編，《二十世紀中國人物傳記資料索引》，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劉錚，〈姚從吾〉，收入劉錚，《西書東藏：中國文化名家的外文藏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頁94-104。

歐素瑛，《傳承與創新——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的再出發(1945-1950)》，臺北：台灣書房，2012。

Frow, John. *Gen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Frow, John.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McGovern, William Montgomery.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 A Study of the Scythians and the Huns and the Part They Played in World Hist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inese Sourc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9.

### 三、網路資料

周婉窈，〈張美惠：從臺北帝大過渡到臺大的傳奇及其變調〉，  
《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25（臺北，2018年10月），  
[https://history.ntu.edu.tw/public\\_html/newsletter/public\\_html/09newsletter/25/25-07.html](https://history.ntu.edu.tw/public_html/newsletter/public_html/09newsletter/25/25-07.html)，擷取日期：2020年1月19日。

《蒙古學報》，<https://cis2.ntl.edu.tw/detail/2834690/>，擷取日期：2025年11月4日。

## YAO Congwu's Life of Reading as Revealed in His Unpublished Diary

Chia-fu Su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rawing on the never-published *Qiangxuezhai Diary* (from December 1950 onward) of Yao Congwu (1894–1970), together with his other writing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ading life of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nd Song-Yuan history. It argues that Yao, who died in his office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gether with other colleagues fleeing to Taiwan, embodied a truly scholarly ethos during a politically tumultuous time. More importantly, he helped to establish a modern disciplinary regime of reading within his new habitus. This reading regime, encompassing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structured and regulated system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t undergirded broader forms of 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t was this regime of reading that filled the postwar rui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thereby making possible both resistance to and accommodation with other, simultaneously emerging and more powerful regimes of reading.

**Keywords:** YAO Congwu, *Qiangxuezhai Diary*, regimes of reading, historiography, scholarly culture